

主编 邱复兴

副主编 苏桂亮 刘庆

庄大川 朴泓霖

孙子兵法大典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孙子兵学大典



第八册



主 编 邱复兴
副主编 苏桂亮 刘 庆
庄大川 朴泓霖

北京大学出版社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孙子兵学大典/邱复兴主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4. 4

ISBN 7-301-06435-7

I. 孙… II. 邱… III. 孙子兵法—研究 IV. E89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2234 号

书 名: 孙子兵学大典(第八册)

著作责任者: 邱复兴 主编

责任编辑: 马辛民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6435-7/E·0004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

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排 版 者: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

印 刷 者: 三河市新世纪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 毫米×980 毫米 16 开本 272.5 印张 4420 千字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全 套 定 价: 680.00 元

卷 首 语

《孙子兵法》问世至今,已逾 2500 余年,其间,世世相袭,代代相因,它不仅哺育了无数古今名将,成为中国军事思想乃至世界军事科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在长期流布过程中,刊刻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著作,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文章,形成了宏大的《孙子》文献。现简述各时期《孙子》著述之大略,以为研读参考。

战国 据《韩非子·五蠹》篇说,当时《孙子兵法》已经是“家有之”了。秦始皇焚书,因《孙子兵法》是有用的兵书,而被保存在朝廷内,幸免火焚。刘邦攻破咸阳,萧何接收秦廷全部典籍,故张良、韩信序次兵书时,竟能有 180 家之多,其中当有《孙子兵法》。

汉代 西汉时代,《孙子兵法》传播的地域已经很广了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孙子兵法》竹简,青海上孙家寨出土的《孙子》佚文木简;从沿海至僻远的西北,都有它的身影,足证其广。官方三次编订兵书,至河平年间任宏“论次兵书”时,《吴孙子》已达 82 篇。自战国至西汉已有传注出现,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孙子》佚文,便是后人写的传注。其实,战国时代已有传注,任宏收集整理时已达 69 篇。有的阐述《孙子》的理论,有的是记录孙武的言行,有的是依记《孙子》而建立自己的理论。这时期的传注不是后世那样附在本书中,而是单篇别行。

东汉重在应用。开国元勋、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冯异“通《左氏春秋》及《孙子兵法》”。军队于立秋日习演“孙吴六十四陈”。《后汉书》中《杨赐传》、《袁绍传》、《皇甫嵩传》,都有征引《孙子兵法》。王充的《论衡》赞扬孙子“善用兵”,王符的《潜夫论》数次引用以论军事。

三国 三国时代是战争频繁的时代,适应形势的需要,《孙子》较普遍地受到重视,《三国志》的纪传里载有许多引用《孙子》以论战争或作战。同时兴起了注释之风。此间,曹操、贾诩、王凌、沈友皆有注释。除曹注以外皆失传。曹操戎马一生,富于战争经验,其注释简洁质切,虽不无失误,多得孙子的本旨。曹注对后世的影响甚大,世以此书作为

《孙子》注释的发端。

晋、六朝 晋篡魏至隋灭陈,这期间学术风气趋于虚浮,崇尚清谈而不务实学。对于《孙子》,从中寻章摘句者大有人在,切实研究者寥寥。300年间所见研究者五人而已,五人中有三人是注释者。梁羊人侃曾为宣城王副抗击侯景,他“尤好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孙子兵法》”;刘勰从文学评论角度赞扬“孙武兵经,辞若珠玉”,肯定《孙子》在文学上的价值。注家中有孟氏,《隋书·经籍志》称其梁朝人,注文收在传本《十一家注孙子》中。另一注家张子尚,不知其确是何时人,自称其所注《孙子》为《孙武兵经》。他与刘勰皆以“兵经”称之,只不知何者为先。又敦煌曾发现一件不及百字的晋写本残纸,有训释词义的注文二则,不知撰者何人。清宣统三年(1911),日本大谷光瑞派探队到敦煌,掠走一批古文物文献,《孙子》残写本即在其中。

隋 隋朝注释《孙子》者萧吉一人。吉精阴阳之学,其注恐脱不了阴阳之说。所注已佚。另有萧世诚注,赵蕤《长短经》、杜佑《通典》皆曾摘引,但注者不详,当不晚于盛唐。或疑是梁元帝萧绎,绎字世诚,但未见有萧绎注《孙子》的记载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有萧绎所撰《玉韬》十卷,或绎于书中引用而以己意释之欤?

唐 唐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,国家强盛,经籍、学术繁荣。初唐时名人所辑类书,如虞世南的《北堂书钞》、欧阳询的《艺文类聚》、魏征的《群书治要》、徐坚的《初学记》等,皆摘有《孙子》之文。名将李靖,少年时已显出有文武才略。他的舅父、隋朝名将韩擒虎说靖:“可与论孙吴之术者,惟斯人矣。”李靖一生用兵,战必胜、攻必取,然而他的兵法著作却世无完书。清代汪宗沂从《通典·兵典》中辑出其谈用兵之言,成《卫公兵法》辑本,《通典》原注中说:“卫公兵法,悉出《孙子》。”《孙子》从进攻的要求出发,主张速决反对持久,李靖则指出防御强敌,应当持久,弥补了《孙子》这一偏颇。赵蕤《长短经》,大量引用《孙子》以为立论的依据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其书:“辨析事势……大旨主于实用。”李筌撰有《太白阴经》,共十卷,前二卷《人谋》上下篇,颇引《孙子》之言,今人汪宗沂说他:“多取《卫公(李靖)兵法》,不加判别,欲干没入己。”杜佑的《通典》收入了《孙子》全文,是把原书的组织拆散重编,加上了他的注释。这些,可视为唐代的综合研究。

唐代是诗歌鼎盛的时代,文学家也注意到了《孙子》,如刘希夷、李

商隐、罗隐以及韩愈、柳宗元等人的诗文中,都曾提及孙武及其兵法,曾任宰相的李德裕的诗,也未忘情于此。《孙子兵法》在此时的图书分类中,也起了变化。变化源自梁阮孝绪的《七录》,附之于诸子类之后,称为“子兵录”,“兵法”二字被删去,只称《孙子》。

五代 五代十国短短 68 年,战乱频仍,无暇顾及学术,许多古籍且遭到毁灭。《孙子》能够保存下来,可谓幸事,这或因其流传区域广与流传量大有关。有一张昭,奉周世宗之命,撰写了《制旨兵法》十卷。此书已佚,仅见于宋施子美《武经七书讲义》引其论《孙子》之言 51 条,似昭仅对引用之文做了注解。

宋 宋仁宗庆历三年(1043)建立武学,以培养军官,并于翌年编订《武经总要》。元丰年间(1078—1085)又校订了武学教科书《武经七书》。此书是由《兵法七书》校补修订而成,何去非主其事。其后又有施子美的《武经七书讲义》,即为武学上舍而写的通俗教材。

有宋一代,注释者十四家,综合研究者三家,汇注本两种,单注本两种,白文本一种,少数民族文字译本一种。

然而,宋朝的对外战争多数是失败的,从而促进了对军事学术的关注。宋人于古籍重义理而轻训诂,因而出现失误,且兵器、装备的改良,尤其是火器的应用,本来是优势。但是,从现存的《孙子》注解来看,是就古言古,于当时所处的优势无所反映,“仁庙时,天下承平,人不习兵。元昊既叛,边将数败,朝廷颇访知兵者,士大夫人人言兵矣。故本注解孙武书者,大抵皆当时人也。”南宋注《孙子》者,都是为了抵御金兵。可见,宋代的《孙子》注,是临时抱佛脚与为了升官。此时也有人反对研究《孙子》,《宋史》对沈起南征的失败,就归咎于他读《孙子》。

在军事学术兴盛中的《孙子》研究著作,已佚者甚多,不能具论。就可见论之,有王彦著《武经龟鉴》。彦是抗金八字军的领袖,此书专以战史作注,当有可观,惜残存无几。梅尧臣是著名的文学家,所注较为简切严整;张预所注,明易通达,还撰有《百将传》;王皙与何氏较之梅、张之注又差之矣。宋代没有对《孙子》作综合研究者,我们把何去非著《何博士备论》等权作综合研究的著作。此书以《孙子》思想为依据,探讨自战国末至五代,一些战争指导者在战略和政略上的得失,颇有精切独到之见。郑友贤的《孙子遗说》是札记三十则,认为十家之注未能尽《孙子》之意,故为之拾遗。其说于孙子思想颇有所发明,也有少量校勘,谓

之为“补注”。

宋代印刷术发达,书籍得以广泛流传。此间《孙子》书中,出现了两大版本系统,即《十家注》——《十一家注》本和《武经七书》本。《武经七书》中又有《孙子》曹注本与白文本,北监本,南监本等多种,现在所能看到的是南宋孝宗时刊本。还有张栻在荆州刊印的杜牧注本,栻有感于南宋为金兵所逼,战乱不断,有似于杜牧所处的时代,故刊印杜注。此间还出现了西夏文译本,体现了民族间文化的交融。

对《孙子》书产生的时代,孙武其人的有无,从先秦到唐代,并无疑义,争议发端于五代的张昭。他认为《孙子》是战国学说,虽未涉及孙武其人,却给孙武否定论设下了置疑的空档。北宋欧阳修主持编纂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,称齐国的孙氏是陈完的后代,这是首次提出孙武的世系,并肯定了孙武的存在。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则谓“孙氏出于卫”,指出“《世系表》皆承用诸家谱牒,故多谬误”。

宋代《孙子》著述甚丰,流传下来的也多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元 元代继宋代科学技术兴旺之后,又有相当的提高。在军事领域,火器较之宋代,其工艺、效能都有长足的进步。遗憾的是,元代多数《孙子》注没有流传下来,可见者只有三种,即潘可大的《孙子释文》,解观、张贲的《孙子注》。张是否元代人尚在疑似之间,他的注在明初刘寅的《武经七书直解》中尚存几条,其校勘多独到之见。元代也有《武经七书》刊本,上海图书馆所藏或即见于《西湖书院重整书目》所著录者。

明 明代是继宋之后,兵学著述的又一个高潮期。各种兵书的数目超过150部,其中注解者达95部之多。专门注释《孙子》的41部(一书多种刊本的按一部计算),余下为注《武经七书》者。

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设武举,于洪武三十年(1397)命兵部刻印《武经七书》,发给附监读书者临期试用。景泰二年(1451)又诏“内外诸学生徒合令兼习”,《武经七书》注本因此而多起来。此时的注解,受宋代理学的影响,重义理而轻训诂,多数是折衷前人、融会众说,少有创见。刘寅的《武经七书直解》,诠释畅达,校勘也颇具识见,勘称佼佼者。因适应选武举、读《七书》的形势,且较优于宋施子美的《讲义》,故刊本甚多。

此时还出现了注文通俗化倾向,如郑灵的《孙子十三篇本义》,其注“只如俗说,欲人易晓”,以便文化水平不高的武士阅读。嘉靖以后,还

印行了各种汇编本,如沈津的《百家类纂》。此类刊本多不甚精。到万历年间,标题讲章之类的书籍开始出现,并逐渐泛滥起来,赵光裕的《武经七书标题正义》是其标识。这类书籍是应武举考试而编的,与儒家书籍《四书备旨》是同类,文笔通俗,衍绎旧说,无当于学术研究。有的则是改头换面,转相抄袭。如万历四十年(1612)金陵万卷楼所刻《百子类函》,是重刻沈津的《百家类纂》,辑者改为叶向高,挖去了沈氏原序,伪造了汤显祖的序文,内容则全同于沈氏书。万历四十四年(1616)刻的《二十九子品汇释评》,是重刻陈深的《诸子品节》本,原文、注文、夹批全同,眉批陈是自批,《二十九子》本则是汇集古今多人的批语,也是自他书移抄来的。此风于标题讲章类为尤烈。

《孙子》旧注本,明代刻印不多。所知有正统年间《道藏》中的《十一家注》本(改书名为“集注”);嘉靖谈恺刊本;隆庆李棣刊本,是重刻谈本;万历黄邦彦刊本,与前三者版式不同。又有《十一家注》的选注本(在曹胤儒撰《握机纬》中)、曹操注九行本(现藏台湾)、杜牧注九行本等。

明代《孙子》书可称者,可取。除刘寅的《直解》外,陈天策的《孙子断注》,参引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等书,注解有精见。李贽的《孙子参同》引《武经》中其他六书与《孙子》相互参证,颇有独到之处。赵本学的《孙子书》可称为明代最佳之作,注解详明,多有精辟之见。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异文,引证战史亦相当确切,因此重刊达五六次。此书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,“日本德川时代,明赵本学之注释书流行最广”(阿多俊介语),研注者多用其说。茅元仪的《兵诀评·孙子》是所撰大部头兵书《武备志》之首。茅氏是一武将,故其注简明扼要而有新意,多阐义理,间有少量的训诂与校勘。此书清代被列为禁书,道光年间书禁渐弛,遂有活字本印行。

明代对《孙子》的综合研究也有可述。戚继光、俞大猷虽无专书论《孙子》,然在他们的著述中亦多有论及。二人以剿灭倭寇的战争实践,对《孙子》有新的发挥。还有何守法的《投笔肤谈》,以自己的研究心得,“仿孙子之遗旨”,写成十三篇,颇有卓见。

明代关于孙子其人其书及评价等仍有争论。宋濂认为《左传》记事不无遗漏,不得以《左传》载与不载定孙武之有无。胡应麟则认为叶适否定孙武的曾存在是“太过”,而孙武破楚入郢之说或是战国时人编造

的。赵本学与戚继光对儒者反对孙武的权诈,给予了严厉的批驳。

清 清代前期还是沿袭明代的风气,以《武经七书》本为依据,大量刊印标题讲章之类的书籍。其中,朱墉的《武经汇解》、丁洪章的《武经七书全解》、夏振翼的《武经七书体注大全》三种较有价值。非讲章类的注解,已知者有六家,郑达的《孙子附解》已佚,所存五家中,当以邓廷罗的《兵镜备考》为优。其他如王瞰的《孙子集注》、汪绂的《戊笈谈兵》,也都各有特点。

清朝的统治巩固以后,统治者逐步走上腐败,军事日趋衰落,大大落后于西方。学术研究又因避文字狱而流于考据一途,学者们多不措意于《孙子》。乾隆末年,考据家孙星衍在华阴《道藏》中发现了《孙子集注》(实即《十一家注孙子》),抄写回来,订正了注家先后次序上的编排混乱,又据《通典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,对十三篇本文及注文做了许多校改,并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改书名为《孙子十家注》。所校颇有善者,虽不免武断之处。他还从《道藏》抄本中摘抄了曹操注,印入《广汉魏丛书》中,又写了自注(未刊行)。后来他又见到顾之逵所藏宋刊曹注《孙子》,由顾千里精摹刻入《平津馆丛书》中。孙氏的校刊本一出世,扭转了清初专重《武经七书》的局面,《十家注》本及曹注本被多次重刻翻印,以至后来的研究者都以此为据。

自孙星衍起,有数人在著作中有所校注,但多数是不甚刻意求精之作。值得提及的有王念孙、毕以珣、于鬯三家。王念孙不但手校了曹注本,且在其名著《广雅疏证》中多次引用《孙子》之言,反过来用,则可作为《孙子》的训诂。毕以珣的《孙子叙录》,对有关问题多所考证,有益于后学。于鬯《香草续校书》,校订十三篇 60 多条,其中有价值者颇不少。此外,古音韵学家江有诰《音学十书》、姚文田《古韵谱》,都辟有“孙子韵读”,为前所未有。嘉庆中,魏源撰有《孙子集注》,他朦胧地看到十三篇中所涵辩证法因素,所以提倡以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之旨理解《孙子》,与考据学家之作当有不同且有新意,惜此书今已不易得见。魏源之后,清末有两位注家可值称道,顾福棠的《孙子集解》与黄巩的《孙子集注》。顾氏颇知西方列强的情况,其《集解》是见清廷战败辱国有愤而作。书中引证外国战例,注意火器的作用,在《孙子》注解中突破了前人的樊篱。黄氏反对考据家的“寻行数墨”,主张将十三篇结合西法而研究之,其注释有较善者,也有校改。然二者均不免有牵附之处。

同时期还出现了把《孙子》通俗化的注释本、改编本和少数民族文字译本。陈任昉的《孙子十三篇直讲》，在原文之间用小字通俗语言联缀起来，使军人易于读懂。陈希夷作《孙子白话演义》，是为广州将弁学堂写的教材。用当时的语体文著述，其理解已接近于近代人的水平。二陈的注译，开了近代白话翻译的先河。改编本有谢文游的《兵法类案》、太平天国的《武略书》、徐经的《孙吴子兵法》、朱煌的《孙子择要》。谢氏录《孙子》要语，以战史作注释；《武略书》是农民起义队伍训练武士的教材；徐经的著作为支持清廷镇压苗族人民起义而作，将十三篇拆散，重编为十二目。清代出现了蒙古文译本与满文几种译本。清代还印有多种白文本，马骥《绎史》与《四库全书》本皆据《武经七书》本。此后，多是据《平津馆丛书》本去掉曹注刊印的。白文本中还有些三寸小本、寸半小本，是书肆为考生进考场作弊挟带用的，多数错字连篇甚为低劣。

清代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等的争论仍然存在。有人提出了新的论据，如姚鼐提出：十三篇中以“主”称国君，在春秋时代“主”是对大夫的称呼，不用以称国君，故《孙子》不是春秋时代的作品。牟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见解，说《孙子》是伍子胥所撰，“武”不是人名而是书名，然此说迄今无人赞同。汉班固曾说：“兵家者，盖出古司马之职，王官之武备也。”清末，有人提出了另外的《孙子》的来源，俞樾认为出于道家《老子》，黄巩则认为出于《管子》。

《孙子》是战争理论著作，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医家已移用其语于医术。《灵枢经》引伯高的话说：“兵法，无迎逢逢之气，无击堂堂之阵。”明代又有了赵本学、戚继光以医药与《孙子》相比照。清初名医徐大椿写了一篇《用药如用兵论》，是专论医药与用兵其理相通。他依据《孙子》的原理结合医疗实际，制订出万一有事时的应急战略战术。

民国 民国年间出版了近 80 种《孙子》注释书，影复排印了大量明、清刊本，还出现了一批研讨孙武及兵法的文章札记，其数量之多，大大超过了刊刻《孙子》最多的明代。在《孙子》书的内容和形式上，也较以往有了较大的变化，引入西方军事思想及现代战例，赋予《孙子》新的内涵。如蒋方震、刘邦骥《孙子浅说》，齐廉《新注孙子兵法直讲》，李天豪《孙子兵法评注》，钱基博《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》、吴鹤云《孙子兵法新检讨》等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此时期实际应用《孙子兵法》尤为突出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后,一批直接指导抗击日本侵略内容的《孙子》书相继出现在军营和社会,如朱怀冰《读孙子十三篇阵中笺释》、韩一青《孙子兵法十三篇浅释》、冯家勋《新译孙子兵法》、李则芬《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》等。同时,也有向非军事领域扩展的倾向,首次出现将《孙子兵法》应用于社会生活的《从孙子兵法研究做事的方法》(张廷灏著)一书。

民国年间一些著名学者参与《孙子》研究,出版了几种水平较高的《孙子》注解、校勘专著,如陆懋德《孙子兵法集释》、钱基博《孙子章句训义》、陈启天《孙子兵法校释》等,其校勘成果,至今仍为研究者所看重。特别值得强调的是,这时期对《孙子兵法》哲学思想的提出和研究,为后来指明正确的研究方向。郭化若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《孙子》之先河,首次对《孙子》的唯物辩证法因素进行阐述,出版了《孙子兵法之新研究》一书。公羊寿的《孙子兵法哲理研究》,也认为“《孙子兵法》实为我国军事哲学之书”。

此期的大多数《孙子》书,适应时代的要求,采用白话译注和加注标点,乃至用图表的形式解释。如叶玉麟《白话译解孙子兵法》、徐容涛《孙子表释》等,对《孙子兵法》的普及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陆达节的《孙子考》等书,对历代《孙子》书详加考辨,著录于一书,在《孙子》文献研究领域迈出了可喜一步。李浴日编辑的《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》,将《孙子》与国外军事名著《战争论》进行比较研究,提升了《孙子》的军事价值和影响。同时,翻译日人《孙子》著作和国人翻译的英文《孙子》书,也是民国时期的一大特色。

民国时期对孙子其人其书等的争论进一步深入,学者们积极参与、发表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。其中,具有代表性的是齐思和的《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》,提出孙子、孙臆非一人说,批驳了“近人考古好合并两人为一人”的弊病,认为孙子“并非虚造”。此说已为1972年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两《孙子》竹简而得到验证。

民国战乱不止,印刷条件简陋,现存《孙子》书已很少见,有的已亡佚,查检阅读极为不便,所幸近年已有影印本出版,可略补此遗憾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,《孙子兵法》得到空前的普及和传播,《孙子》研究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,不论著述的数量还是质量,都是历代无可比拟的。50年间,共出版有关《孙子兵法》的著作

440余种,其数量超过了民国以前历代的总和,突出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传统研究得到了加强,推出了一批注释、校勘的力作。如郭化若的《孙子今译》、杨炳安的《孙子会笺》、军事科学院战理部注释小组的《孙子兵法新注》、银雀山汉墓竹简小组的《银雀山汉墓竹简·孙子兵法》、吴九龙主编的《孙子校释》、钮国平的《孙子释义》、朱军的《孙子兵法新译》和李零的《吴孙子发微》等,这些著作或校勘精审,多有发明;或注释详备,译文信达;或另辟他途,富于新意,为学界所称道。

对《孙子》义理阐发有新突破,出现了系统论述孙子思想的专著。如陶汉章著《孙子兵法概论》,以刘伯承元帅研究《孙子》为基础,对孙子军事原理、原则多有精辟的论述;吴如嵩著《孙子兵法新论》,将孙子军事思想进行系统地归纳,概括为十六论,突出了孙子对军事理论的贡献;刘树新著《孙子兵法战术思想研究》,则对孙子的战术思想做了深层次的挖掘,使其更富于现代意义。

研究领域拓展扩大,新著迭出。如对《孙子》哲学思想的研究,出版了首部专著——《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》(关锋著),以及陈学凯的《制胜韬略——孙子战争知行观论》等;又如将《孙子兵法》与国外军事名著进行比较研究,出版了王士松等主编的《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导读》、薛国安的《世界兵学双璧——〈孙子兵法〉、〈战争论〉研究》、陈西进的《孙子兵法与西方战略》等专著;再如将《孙子兵法》与现代军事科学相结合,有储道立的《孙子的用兵艺术》、岳永玉等的《孙子兵法与高技术战争》、李建中的《孙子兵法与用兵之道》等。

《孙子》文献研究填补空白,硕果累累。孙子生平事迹,限于文献匮乏,历来是《孙子》研究的难点,代无成书,留下空白。20世纪90年代后,坚冰被打破,相继出版了谢祥皓等的《兵圣孙武》、杨善群的《孙子评传》、黄朴民的《孙子评传——一代兵圣的生平与思想》等反映孙武的传记达五六种。此外,还出现了一批专题工具书,如吴如嵩主编《孙子兵法辞典》、古棣主编《孙子兵法大辞典》等四部专科辞典,编制出版了《孙子学文献提要》(于汝波主编)专科书目,以及影印出版大型文献丛书《孙子集成》、《中国兵书集成》等。同时,围绕银雀山汉墓竹简《孙子兵法》的整理,以及《宋本十一家注孙子》的影印出版,而出现的《银雀山汉简释文》(吴九龙著)、《十家注孙子兵法译注》(盛瑞裕等译注)和《十一

家注校理》(杨炳安校理)等专著,把《孙子》文献研究推向历史的最高峰。

外文译著骤增,国际交流异常活跃。在世界性“孙子热”中,《孙子兵法》外文译本不仅在国外被翻译出版,而且国内的新译本也不断出现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出版英、日、德文译本14种,语种由单一的英文,扩大到六七种文字,仅《孙子校释》一书就附有英、日、法、俄、德、阿拉伯六种文本,这在《孙子》研究史乃至世界出版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。同时,翻译日本、韩国《孙子》书五种,还出现外国人以中文著述《孙子》并在华出版的现象。日本服部千春先后在华出版了《孙子兵法校解》和《孙子兵法新校》两部专著,以及《孙子兵法新校字帖》,首启外国人在华出版《孙子》书之风,谱写了中日《孙子兵法》交流的佳话。

著作样式新颖,版本丰富多彩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随着科技的发展,《孙子》书的载体样式也有发展,出现了磁带录音、光盘演示、电脑检索等现代高科技载体出版物。如山西教育出版社录制由赵忠祥播讲的《孙子兵法》音带;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光盘《孙子兵法——中国智慧之海》(刘庆主编)和杨少俊等开发的《孙子兵法微机检索专家系统》等,在这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尝试。在著作形式上,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一改传统的文字著述,出现了书法字帖、画册、印谱等多种样式。不仅品种多,而且数量大。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孙子兵法连环画丛书》,用500余幅图画解说《孙子兵法》,为传播《孙子兵法》提供了一种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好形式,多次重印,发行总数达23万套,并获得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图书奖的殊荣。在书籍材料上,近年来还出现了丝绸版、黄金版、仿竹简版《孙子》,以及多种大型豪华精品书。这些《孙子》书的出版,极大地丰富了《孙子》版本的内容,对普及《孙子》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《孙子兵法》应用类图书异军突起,数量可观。据统计,自1979年至1999年,20年间共出版将《孙子兵法》运用到社会生活领域的专著达117种,内容涵盖企业管理、商业竞争、体育竞赛、医疗卫生、人生处世等方方面面,大自国企改革,如宋志勋的《孙子兵法与国企攻坚》、国家管理,如管正的《孙子兵法与行政管理》、经济战略,如吴岐山的《孙子兵法与经济发展战略》;小到股票炒作,如侯以莅等的《孙子妙计炒股》,企业公关,如檀明山的《孙子兵法与攻关》,人际关系,如万胜的《孙子兵

法与人生谋略》等等,内容丰富。特别是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著作,不仅数量多,而且内容充实,理论层次高。如李世俊等的《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》、陈炳富等的《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的应用》、杨先举的《兵法经营十谋》、周三多的《孙子兵法与经营战略》、王健民等主编《孙子兵法与商战谋略》等,把《孙子兵法》与现代管理理论有机结合起来,初步形成了具有东方特点的管理理论,引起世人的瞩目。

50年来,研究《孙子》的论文更是层出不穷,数量达1870余篇。这些文章除在专业性的刊物如《孙子学刊》、《东方谋略》、《军事历史》、《中国军事科学》等发表外,大部分是在全国大专院校的学校和其他社科类期刊上发表的。研究的内容,既有对传统学科的深入探讨,也有对新学科的揭示论述。在传统学科方面,重点围绕孙武的生平事迹、故里,《孙子兵法》的成书年代、版本源流、优劣等,以及近年来对日本樱田本《古文孙子》和西安发现的“《孙武兵法》82篇”真伪问题而展开的争论,都取得了重要成果。有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,趋于统一;有的则挖掘出新的材料而使研究有所进展。在新学科研究方面,虽然起步较晚,但涉及面广,新意迭出,成果显著。如对《孙子》的军事思想的研究,通过全方位的诠释,形成了适应现代需要的孙子军事思想体系。对《孙子兵法》蕴含的其他学科内容,如哲学思想、经济思想、管理思想、伦理思想、心理学思想、运筹思想、预测思想、系统思想、信息思想、法学思想、美学思想等,以及《孙子兵法》的文学价值,均有所涉猎。传统学科和新学科的结合,极大的丰富了《孙子兵法》的研究内容,扩大了《孙子兵法》的影响,使《孙子兵法》这朵奇葩,更加光彩夺目,更富生命力。

外国 《孙子》的外传,最早是朝鲜,又由朝鲜传到了日本。何时传到朝鲜,尚无确切资料,传入日本,似在隋代。日本推古十二年(604)颁布的《十七条宪法》中,多处暗引《孙子》语句,足见《孙子兵法》在当时已有相当影响。有明确记载的是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,于公元717年至734年到中国留学(唐玄宗开元五年至二十二年,日本养老元年至天平六年),回国时带回了大量的中国典籍,其中就有《孙子》。自从它传入日本,就被朝廷、幕府垄断,只在少数亲贵中传习,不向外扩散。

宋代施子美的《武经七书讲义》于镰仓时代已东传日本,并在上层亲贵中流布。德川家康建量江户幕府,于庆长十一年(1606年,明万历

三十四年)以木活字刊印《武经七书》,即用《讲义》去掉注文,又以明刘寅的《武经七书直解》加以校勘而成。此举成了公开流行和研究的开端。日本大儒林罗山于宽永三年(1625年,明天启五年)奉德川家光之命撰写了《孙子谚解》,首启注释之风。此时《孙子》已渐扩散,同时中国的《孙子》注释书,也不断地输入,有著名的注解也有标题讲章,刘寅的《直解》就是其中的代表。此时期研究者也大批涌现,形成了江户幕府时代的甲州、越右、北条、山鹿、长沼五大流派。赵本学的《孙子书》传入日本是一件大事,它取代了《讲义》、《直解》的地位。日本学者阿多俊介曾说:德川时代,明赵本学之注释书流行最广,幕府时代的《孙子》注释多用以参考。

北条氏长在日本研究《孙子》的学者中占有特殊的地位。他为鲜为人知的《古本孙子》,即后来樱田迪的刊本,写了《孙子外传》。北条家族曾在镰仓幕府时代掌握大权达141年之久,故有得到此“禁秘书,讳言出处”的古本。此后又有获生徂徕的《孙子国字解》,内容极详细,引有丰富的战例,是第一部以日文注释《孙子》的著作。江户后期的学者的特点是吸收了西方的观点。江户时代研究《孙子》的大有人在,注释、翻译、重刻中国重要译著很多,明治维新至现代久而不衰。

幕府以后大量的中国版《孙子》仍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,日本重刻也仍在进行。传入日本的《孙子》书,有些已佚于中土,而存于彼邦。宋施子美的《武经七书讲义》,自室町幕府时期已传入日本,在我国却久已失传,直至近代上海自强书局才据日本版在国内石印发行。宋版白文本《武经七书》于清末被日本岩崎氏买去,我国现在只有据岩崎氏藏本的影印本。《十家注孙子》是日本昌平坂学问所刊本,与国内流传的《十一家注孙子》不同,其中的王陵、张子尚、贾诩、孙臆四家注为十一家本所无,而十一家本中的孟氏、杜佑、贾林、何氏、张预五家又皆十家本所无。日本樱田氏刊本与传本多有不同,是较早传入日本的古籍,在国内只知有两本,一藏湖北省图书馆,是晚清杨守敬自日本购回者;另一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。敦煌晋写本残存不到百字,1911年大谷光瑞派桔瑞超等组织探险队赴我国敦煌,弄走了大批珍贵文献,其中就有此晋写残纸《孙子》。

日本不但重印、翻译、注释《孙子》,学者们还对孙武的身世、兵法成书的年代,字句的校、勘、训诂的分析,思想的综合探讨等方面的研究,

做出了贡献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之后,很快出现了对竹简进行研究的专著。在应用上,也从军事扩大到企业管理、体育竞赛、人生等方面。这类《孙子》书,不但数量多,而且研究起步早,质量高,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。

朝鲜接触《孙子》早于日本。但是,研究的规模却远逊于日本。目前所知,明永乐七年(1404),始用铜活字大字官版印刷了《十一家注孙子》;清乾隆四十二年(1777)赵义纯的《孙子髓》,金相一译为朝鲜文的《孙子兵法》,附撰者的解说;金昌的《孙子真传》。当代有林一峰、独孤映等的译本。还有郑飞石的长篇小说《孙子兵法演义》。

亚洲其他国家,如越南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也都有译本问世。

《孙子》传入西方,最早的是177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阿米奥(J. J. M. Amoit)所译法文。他以意译为主,又将注释与他本人的见解混入正文。其实这不是学术性的译作,他是奉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大臣贝尔东的旨意,来中国从事谍报活动的,所译是情报材料。1972年又有弗朗西斯·王译本。

最早的英译本是1905年在日本学习日语的英国皇家炮兵上尉卡尔思罗普(E. F. Calthrop)据日文译本转译的,错误很多。英国汉学家贾尔斯认为这个译本“使孙子蒙羞”。贾尔斯(Lionel Giles)自己以清孙星衍校本为底本做了重新翻译。他的古汉语造诣很高,曾译儒家的“五经”。他译的《孙子》考证严谨,文章流畅,所以流传至今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有马切乐-科克斯(E. Matherell-Cox)和悉尼大学教授萨德勒(L. Sadler)译本。我国则有1946年郑麀、1969年唐张译本。以上四种或因匆忙失之草率,或因英文水平较差,没有起到多大作用。值得重视的是,1963年美国海军退役准将格里菲思(Samuel B. Griffith)的译本,订正了贾尔斯译本中的一些错误,弥补其不足,是一个较好的译本,被列入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代表作翻译丛书。1988年美国研究《易经》与道学的专家托马斯·克利里(Thomas Cleary)又翻译了《孙子》,译文简练,但对原文颇多删节。

俄罗斯译本有1860年斯莱兹奈夫斯基译本;1950年苏联著名汉学家H. И. 孔拉德译本,此本在苏联有较大影响;1955年又有西多连科译本;1979年K. B. 凯平译本,仅《孙子》的第五篇,木刻本一卷。

德文译本,1910年布鲁诺·纳瓦拉(Bruno Navana)译本,此本已极

少见;此后1988年冯·尤根·兰克斯基(von Jürgen Langowski)有新译本,是据英译本转译的。

意大利译本三种,即1980年帕多安(R. Padoan)、1988亚利山德罗·科奈里(Alessandro Galessandro Corneli)及一佚名者据贾尔斯英译本转译的。

罗马尼亚有菲莉契亚·安蒂普与康斯坦丁合译本;捷克斯洛伐克1949年有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·普舍克(Jaroslav Prusek)译本;1986年荷兰史密特(Smith)译本;希腊科·康斯坦丁诺斯·乔甘塔斯译本。近年来,又有阿拉伯文等译本出现。

以上所述,很不完备(详见本书《历代研究卷》)。即使是仅有的这些,已可见《孙子兵法》在世界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泛,影响越来越大。

河南社会科学院杨炳安同志和我,在多年前不断切磋《孙子书录》和《孙子研究参考资料》,使之不断完善。此次编入《孙子兵学大典》,又将封存已久的两部旧稿子略加增补。在修改过程中,得到了苏桂亮同志多方面的大力帮助,又参考了于汝波同志主编的《孙子学文献提要》,周洪才主编《孙子兵法概览》书稿,得益良多;日本友人阿竹仙之助、服部千春先生为本卷撰写有关内容并提供大量资料,贡献殊多;王健、苏未同志参加了日文的翻译工作;高殿芳同志提供部分日文书目和资料,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。本卷由我和苏桂亮同志合撰。他负责上编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外部分,以及下编内容的编撰,并承担了全卷的统稿工作,特此说明。

乌肃哈拉·穆志超

2001年4月于北京小蜗庐